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篇》版本初探

澳門博物館
陳麗蓮 黃燦樹

2018年4月

一·前言

鄭觀應著作的編輯和刊印過程，暫未見有學者作過詳細的疏理和研究。我們發掘到 1907 至 1913 年間的一些文獻，當中涉及了鄭觀應著作的出版情況。雖然年份不算很長，加上文獻的內容多採用“大稿”、“詩稿”、“詩集”、“文集”、“續編”這些字眼來代表其作品，但有些文獻我們還是能利用內容中的直接資料和間接資料作出判斷和推測。此外，根據鄭觀應著作書籍的出版年份，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文獻，應該與《羅浮侍鶴山人詩草》(1909)、《盛世危言後篇》(1921)、《待鶴山房詩集》(1909) 和《待鶴山人七秩唱和詩集》(1910) 的出版有關。

其中，《盛世危言後篇》的出版過程，拖宕經年，一波三折。因此引起我們的興趣，並發現澳門何東圖書館所藏的《盛世危言後篇》（以下稱“何東館版本”及南京圖書館所藏的《盛世危言後篇》（以下稱“南京館版”）是其出版故事中的兩個代表證物。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疏理和研究，以及對兩個版本《盛世危言後篇》的比較，我們可以大致瞭解之前一直令我們詫異的質量問題，以及為何鄭觀應此後將其著作的印製，全部交予上海出版商的原因。



南京圖書館藏《盛世危言後篇》

二·研究起因

《盛世危言後篇》由鄭觀應（1842-1921）著，潘飛聲（1858-1934）編，何卓勳（生卒年待考）校。對此書的出版原意，以及鄭觀應此書的意義，潘飛聲在其序言中有以下的敘述：

余于戊申十月至澳門，寓侍鶴山房三月餘，與山人日夕討論時局，盡讀叢稿十六冊。乃采擇要著編為八卷，名曰《盛世危言後篇》，以別於“前篇”。蓋“前篇”者言其所知也，“後篇”者行其所言也。

2008 年，筆者在籌備《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物展》時，借閱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篇》，發現此書除了冊數缺少外，還存在卷頁順序前後錯亂，各冊印版長短有異，故筆者曾一度疑為此書是拼湊而成的“積木書”。



澳門何東圖書館藏《盛世危言後篇》

後來我們發現，在 1909 年至 1913 年間的鄭觀應歷史文獻中，有多份關於他刊印著作的紀錄。這些文獻主要是圍繞“詩集”和“文集”的出版事。其中有鄭氏與不同印書局、印刷行的直接聯絡，也有他人代鄭氏與印書局聯絡後、處理問題後的情況報告，還有一些是印書局的帳單、財務文件

等等。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從中窺視鄭觀應對其著作出版的處理方法，以及排印過程中發生過的問題。

這些文獻顯示，除了認真地對待文稿的撰寫和修改，鄭觀應在著作的編輯和排印上，也曾花費不少的時間和人力，甚至為求質量，將書籍的出版工作拖宕經年。其中，在多份文獻中提及的“文集續編”（也有稱為“待鶴續集”、“文集”）是一個特別的案例，與《盛世危言後篇》有關，因此引起筆者的注意和研究興趣。

三·《盛世危言後篇》的刊印安排

1909年2月15日，印刷行招安甫（文鴻）致函鄭觀應，“前承 厚意委刊文集，交來紙辦。本港洋行商店，此種紙樣均已無存。現專差人上省尋覓，并函達上海同業代購”。¹由此可知，鄭氏出版著作，連紙樣都是自己先選好，交由印刷行代購。招安甫在同月24日的信中，還透露在香港和廣州找不到合鄭氏之意的紙張，已着人到上海尋找，但未有回音。²

至於印刷字粒，鄭觀應也有講究。在多封往來信件中，都有提及文集的印刷式樣、字體和字型大小的印刷規格。招安甫甚至要為鄭觀應屬意的兩種字款未有找到，而店裡提供的字款又不合鄭觀應意，新鑄字機又未到，特函向鄭觀應致歉。³

更有遺憾的是，此書的印刷一波三折。1909年7月9日，印刷行翰華閣司事馮襄廷覆函鄭觀應，披露了文集印刷過程的種種問題。其中主要有六點：

1. 收到鄭觀應隨信付回的，列明錯處的印稿十餘張。表達“仰見大人作事精細，防有失觀瞻之意”。
2. 之前所訂的價格太低，“除了工料之外所獲無幾”。因此要求鄭氏“念生意維艱，不惜區區之小費，以津貼小店”。也就是說，要追加費用。
3. 對於鄭觀應在信中投訴校對人文理不通，建議印刷行另請通文理者擔任校對，店方的解釋是由於人工成本所限，“若請認真通順之人”，則“無利可獲”，“反為虧本”。
4. 排版出錯的原因，是鄭的原稿有“改而復改之”的地方，有些字體難辨，“地名人名則難度也”。但通篇內容更多是為其差錯強找藉口，例如因為該店的日常管理“每日印該文集約十篇，規矩執起就印，端無停留以妨礙下篇”，因此無法再做核對工作。店中伙記一天工作“未免眼花心忙或者精神不到”，“核對人非終日在舖，有時外出，必要別伴以代之”。

¹ 《招安甫致鄭官應函》，1909年2月15日，盛宣懷檔 049075-62，上海圖書館藏

² 《招文鴻致鄭官應函》，1909年2月24日，盛宣懷檔 049383-6，上海圖書館藏

³ 《招文鴻致鄭官應函》，1909年3月22日，盛宣懷檔 049383-4，上海圖書館藏

甚至竟然說出“首卷所錯之字俱係差些字畫，同其字母而不同其音，非大錯特錯”。以這種今天看來仍然令人無法接受的藉口，店家卻提出如果鄭觀應要求翻印得多，則要“賞回津貼，以免小店大為吃虧”。

5. 鄭觀應要求不可用木字粒，着店方往港購買字粒。店方稱常用字粒一般只存不超過 5 個，大行也不超過 10 個。並推搪當字體不够時，刻木字以頂替乃是行規。
6. 至於鄭觀應投訴字劣墨不勻，馮襄廷的回覆竟然是：“小店非不自知，惟印務一項上海與廣東本優劣懸殊，人人所知”。“小店為印該文集，已特往港購字百金”最後又是重覆店中“皮費浩繁”，要求鄭觀應安排付款四十元，“俾得司事人專心校對，以免一心掛二路之想，於校對上不無裨益”。⁴

四個多月後，馮襄廷於 1909 年 11 月 29 日再次致函鄭觀應。信中透露了下列的訊息：

1. 定印的“文集續編”三百套原訂四個月竣工，乃因“被夥伴印錯並各伴難靠之”，而拖延至六個月始克竣工。
2. 先訂裝八套為書樣。
3. 稍後加入目錄、地圖和書面簽。
4. 鄭觀應原訂三百套，但印商私自加印五十套原擬送人。但核數後發現“不獨無利可獲，反為虧了數十元之血本”，因此要求鄭觀應取足三百五十套，多付費用以作幫補。
5. 要求鄭觀應提前付款，以助印刷行在年晚之際支付費用。⁵

儘管鄭觀應在 1910 年春親身到翰華閣“將所改之文集指示一切與(予)夥伴知之”。然而，到了 1910 年 10 月 30 日，馮襄廷致鄭觀應的信中仍是為印刷的延誤，特別是為書籍的延誤尋找各種各樣的藉口，其中包括“因小店修舖阻滯數月”，“該伴不在舖”，“該紙缺乏總無貨到”⁶。到了 1912 年 5 月 20 日，馮襄廷的信中內容，仍是透露未能完成出版的工作。但我們卻從中得悉，由於當時已是民國成立之後，鄭觀應認為“該集必要大加修改”，以期符合當時的體制，並要求印店先行釘裝書樣以作修改之用。然而馮氏卻在信中說，由於此書一改再改，已拖宕三年之久，“墨色走色，紙張變黃，更加所改數次紙色參差。因此建議鄭觀應“不如重新再印過之為妙也”。

我們暫時未能在檔案的文獻中查找到鄭觀應對馮襄廷“重新再印”建議的答覆。但何東圖書館所藏的 1909 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後編》，同樣存在着種種的

⁴ 《馮襄廷致鄭官應函》，1909 年 7 月 9 日，盛宣懷檔 049451-4，上海圖書館藏

⁵ 《翰華閣致鄭官應函》，1909 年 11 月 29 日，盛宣懷檔案 049318-2，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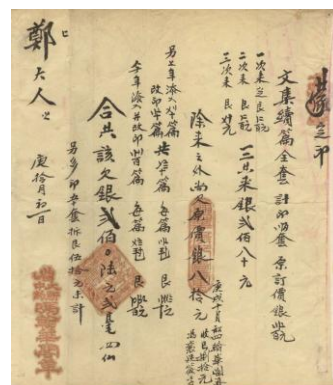
⁶ 《馮襄廷致鄭官應函》，1910 年 10 月 30 日，盛宣懷檔 049384-6，上海圖書館藏

印刷問題。根據中央圖書館的書籍索引資料，此書館藏六冊，缺第一冊卷一，第三冊的卷四及卷五。然而，筆者在第二冊《卷三·立憲》中，卻發現了這樣的問題：第一頁的魚尾欄處，印的是“卷三／一”，第二頁印的卻是“卷一／二”，同樣的情況一直發生到第二十二頁。但在第二十三頁至四十頁，魚尾欄的標示又重覆為“卷三”。此外，書籍每冊的長度不均，因此作者第一次看到此書時甚是困惑，甚至懷疑是“積木書”，即由兩套或是多套書籍拼湊而成。

中央圖書館（何東圖書館是中央圖書館的屬下分館）在館藏資料中有這樣的附註：“此套書籍約於 1993 年購於本澳木橋橫街萬有書店(已結業)，買入價為當時澳門幣 1000 元正”⁷。

至於印刷行“翰華閣”的所在城市，筆者也有不同的發現。夏東元教授認為鄭觀應在 1910 年將“《盛世危言後編》原稿交上海翰華閣書店刊印”⁸。但從上述的上海圖書館藏的文獻中顯示，1909 年 7 月“翰華閣”已開始了排版的工作。同時，在回應鄭觀應投訴印刷質量問題時，翰華閣老板馮襄廷在信上說“來示又云不可用木字，總要不惜小費往港買多些字粒云云，此說在行外之人度之。……來示又云字劣墨不勻，小店非不自知，惟印務一項上海與廣東本優劣懸殊，人人所知。惟小店因印該文集，已特往港購字百金”。由此可見，“翰華閣”應該不在上海，也不在香港。

而筆者所查的歷史文獻中，一張翰華閣帳單上有兩枚印章，印章上分別有“省大新中約翰華閣文記單”及“大新街翰華閣”等字樣。因此筆者推斷印刷行“翰華閣”應位於廣州大新街中約。昔日的大新街即今天的大新路，1931 年廣州市政府改建為馬路。



翰華閣帳單

四·推斷及待考問題

關於這次翰華閣的“文集續編”印製一事，目前仍存在以下的三個問題。為此，筆者於 2014 年 7 月曾到南京圖書館，查閱其所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並有以下的發現：

1. 翰華閣裝訂的樣書質量和數量

如前文所述，1909 年 11 月 29 日翰華閣司事馮襄廷致信鄭觀應，信中提到的八套樣書之一。因為信中說“先行釘庄（裝）八套……俟下次全行釘庄，然後加入目錄、地圖、書面簽”⁹。

⁷ “館藏檢索”，中央圖書館網頁，<http://webpac.library.gov.mo/store.dll/?ID=333193&T=0>，2014 年 5 月 12 日

⁸ 夏東元：《鄭觀應文集》，澳門：澳門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第 496 頁

⁹ 《翰華閣鄭官應函》，1909 年 11 月 29 日，盛宣懷檔 49318，上海圖書館藏

然而，近一年之後的 1910 年 10 月 30 日，馮襄廷在鄭觀應“大駕光臨將所改之文集指示一切與（予）夥伴知之”，而他其時剛巧“有事旋鄉未獲當正領教，甚以為憾”，因此致函鄭觀應，在一大段為延誤事作自我解釋後，有以下的文字內容：

商見此十套乃係校對之用，是以不曾齊墨與及未夾入地圖與相。該集訂妥之後，商悉心看過始知卷一有兩篇序未改；卷二《政治》又漏欠 55、56 兩篇……¹⁰

由此可見，樣書的數量已由原來的 8 套增為 10 套，但所裝訂的樣書錯漏甚多。這 10 套書樣已在 11 月 8 日打包送交招商局轉予當時人在上海的鄭觀應。¹¹

2. “文集續編”是否《盛世危言後編》

存疑的理由是：在“翰華閣”的帳單中，有“另代支畫師寫地輿圖工艮貳元，另代支寫輿圖內字工艮陸毛”¹²的項目，而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一書中卻未見有任何的地圖。南京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則有鄭觀應的相片“待鶴老人八十小影”。

肯定的理由是：因為鄭觀應在民國之後出版的文集，只有《盛世危言後編》。筆者也在鄭觀應文獻檔案中，找到了一頁《盛世危言後編卷十四·賑務》的原稿¹³（《盛世危言》其他版本的原稿，至今未有在檔案的文獻中發現）。

在南京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中，有多處顯示日期的地方。按書頁順序分別為：扉頁處王洵的題字為“己酉孟秋”（1909 年）；潘飛聲序為“宣統二年”（1909 年）；何卓勳序為“宣統三年”（1910 年）；鄭觀應自序為“宣統元年”（1908 年）；《卷一·道術》為“癸未至庚戌”（1883-1910），即書內的文章收錄至 1910 年。印刷的時間跨度達三年之長，符合《盛宣懷檔案》的文獻內容。

因此，筆者趨向認為“文集續編”便是《盛世危言後編》。

3. 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是否屬於“翰華閣”出版的其中一本。

筆者在疏理上文的文獻時，一直有此懷疑。如果“文集續編”便是《盛世危言後編》的話，既然“翰華閣”在出版鄭觀應的“文集續編”過

¹⁰ 《翰華閣鄭官應函》，1909 年 10 月 30 日，盛宣懷檔 49384-6，上海圖書館藏

¹¹ 《徐恩成致鄭官應函》，1909 年 11 月 08 日，盛宣懷檔 049384-1，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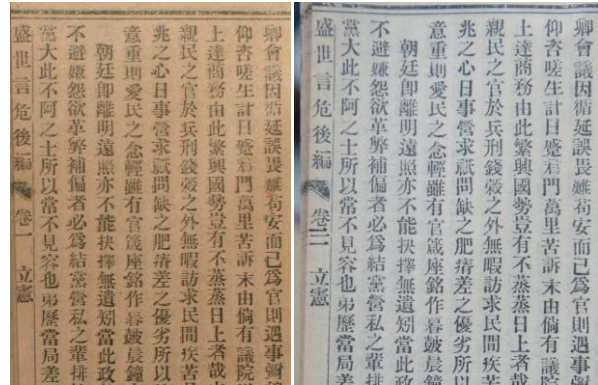
¹² 《翰華閣致鄭官應函》，1909 年 11 月 29 日，盛宣懷檔案 049318-3，上海圖書館藏

¹³ 《鄭官應著作與賑務便條》，日期待查，盛宣懷檔 049129，上海圖書館藏

程中，存在很多的質量問題，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也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而且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原有八冊，符合 1909 年 12 月 3 日徐恩成致鄭觀應函中所述“待鶴續集現經印就，分八部釘裝，今日已由翰華閣送到廣仁，經即代倩丁錫五兄代為檢校”¹⁴的內容。

此外，筆者推斷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是馮襄廷於 1909 年 11 月 29 日致鄭觀應信中提到八套樣書之一。因為信中說“先行釘庄（裝）八套……俟下次全行釘庄，然後加入目錄、地圖、書面簽”¹⁵。而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也是沒有目錄、地圖和書面簽。

同時，把何東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與南京圖書館藏的作對比，發現兩者本來是屬於同一個版本。不但封面及內頁多個版面細節特徵一樣，而且一些版面上的瑕疵是相同的，只是南京圖書館藏的是在原版上再經過修改。其中一個例子是上述的《卷三·立憲》。在何東圖書館藏的《卷三·立憲》中出現的問題，在南京圖書館藏的作出了修改，將原來“卷一”的“一”字上下加了一橫，變成“卷三”¹⁶。但修改後的“三”字並不自然，明顯存在後加工痕跡。



何東圖書館藏（左）與南京圖書館藏（右）之《盛世危言後編》之《立憲》篇

再者，儘管經過修改，南京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仍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紙質不一、字版長度不一、墨色不勻、個別頁面歪斜……等等。勘誤表所列的錯處就有 64 項之多。

因此，筆者推斷，何東圖書館所藏與南京圖書館所藏的來源都基於同一個原始的印版，但何東圖書館所藏的為《盛世危言後編》的樣書。

4. 《盛世危言後編》印刷時間的跨度及版本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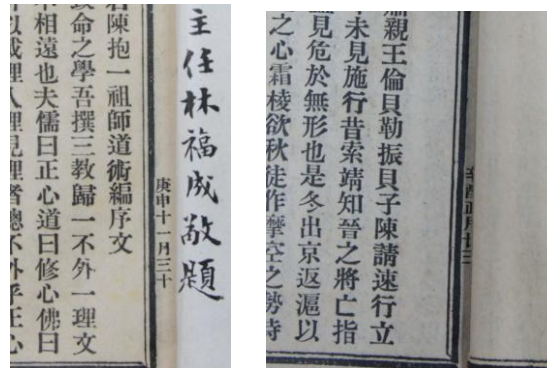
《盛世危言後編》儘管在 1909 年已開始了編印工作，但在 1920 年仍有不同的排版。根據南京圖書館藏《盛世危言後編》顯示，不同的序言在頁面夾縫處所刻的日期不同。其中陳抱一的序言是“庚申十一月三十”（1920）；何卓勳的序言是“辛酉正月廿三”（1921）；自序及卷一的夾縫所顯示的日期則是“戊午六月廿六”（1918）。

¹⁴ 《徐恩成致鄭官應函》，1909 年 12 月 3 日，盛宣懷檔 49317-8，上海圖書館藏

¹⁵ 《翰華閣鄭官應函》，1909 年 11 月 29 日，盛宣懷檔 49318，上海圖書館藏

¹⁶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之《卷三·立憲》，第七頁上，南京圖書館藏

從 1909 至 1921，在這 12 年的跨度中，《盛世危言後編》是否因為排印問題只出版過一次，其中出現過何東圖書館所藏的樣書及南京圖書館所藏的版本？或者是陸續出過不同的版本？若是如此，期間又有多少個版本？這些存疑，留待日後繼續查考。



南京圖書館藏《盛世危言後編》，陳抱一及何卓勳序言夾頁處顯示的排版日期

上述僅為筆者的推斷，而其中的疑問仍待進一步的後續研究。鄭觀應對其著作編輯、刊印的安排過程和要求，我們可從中窺知一二。而翰華閣馮襄廷信中的一句“惟印務一項，上海與廣東本優劣懸殊”，也讓我們明白到為何鄭觀應在此後出版的書籍，包括《待鶴山人七秩唱和詩集》(1910，著易堂)，《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1920，上海各教統一會)，以及《待鶴山人唱和集》(1921，滬北公學)，都是上海出版。

六· 結論

以 1909 年已 67 歲，1921 年則是 79 歲高齡的鄭觀應，對出版“行其所言”的《盛世危言後編》，本應有着急切的期待。而作為曾出版過多本著作的他，對印製質量也應該有一定的要求。

然而，《盛世危言後編》卻拖宕多年，過程一波三折，最後仍存在不少的質量問題。其原因我們通過文獻的疏理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1. 文獻顯示，1909 年“翰華閣”已收到鄭觀應的紙樣，並按書籍的規格和要求提供了報價。直到 1910 年 11 月方裝訂樣書 10 套以供審校。歷時近兩年。
2. “翰華閣”的生產規模、管理水準，尤其是經營態度令排版質量存在嚴重的問題。
3. 而鄭觀應當時人在上海忙於參與招商局事務，卻選擇了位於廣州的商號“翰華閣”，因此只能假手於他人跟進排版印刷的事宜。
4. 1912 年 7 月之後的印刷出版情況，再未見有歷史文獻顯示。
5. 以何東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藏的《盛世危言後編》作對比，筆者認為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歷史文獻中所指的“文集續編”就是《盛世危言後編》，而且是由“翰華閣”印製的版本。

6. 筆者推斷何東圖書館所藏的是 1910 年裝訂的 10 本樣書之一，而南京圖書館藏的是在樣書的基礎上，經過修改後而出版的書籍。
7. 儘管南京圖書館對其所編書號 GJ/700184 的《盛世危言後編》訂定出版年份為 1911 年¹⁷，但根據其序言夾頁中的日期顯示，排版工作在 1921 年仍在進行中。
8. 1921 年 6 月 14 日，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去世。但願他生前能看到此書的出版，以慰心願。

¹⁷ 南京圖書館書籍檢索網頁 http://opac.jslib.org.cn/F/-?func=find-m&find_base=njl01&adjacent=N&find_code=TIT&request=%E7%9B%9B%E4%B8%96%E5%8D%B1%E8%A8%80%E5%BE%8C%E7%B7%A8, 2018-05-07